

边区的文化（代序）

聂荣臻

尽管战争空前激烈，物质条件极端贫乏，但是，由于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抗日和民主的新生活，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

边区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首先是从学校教育的恢复和改造开始的。

晋察冀区域内原来的教育工作^①，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溃逃而瓦解了。当边区社会秩序渐渐趋向稳定的时候，边区政府立即指示，所有各地的小学限期一律恢复上课。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修缮校舍，编撰课本，培训师资，筹集教育经费。为此，边区政府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教育行政系统，各级都有专管教育的机构。他们对恢复学校工作抓得很紧，到 1938 年，边区各村庄普遍建立了初级小学。

基于当时的需要和可能，每一个专区又创办了一所中学。在中学之上，还有从延安过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抗大二分校。华北

联合大学由成仿吾同志任校长，抗大二分校由陈伯钧同志任校长。此外，边区自身还创办了抗战建国学院，院长由宋劭文同志兼任，副院长是过去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郭任之。华北联合大学、抗大二分校和抗战建国学院都培训了大批干部。据 1939 年的统计，边区已有 3 所性质不同的大学，6 所中学，小学在 1 万所以上，在校学生共计 40 万人。这些学校大多是因陋就简建立起来的，行动比较灵活，很能适应当时的游击战争环境。此外，边区还开展了夜校、识字班、扫盲班等多种形式的教育，借以普遍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

新闻出版机构，是边区文化战线一个很出色的工作部门。晋察冀边区的《抗敌报》(后改名为《晋察冀日报》)《救国报》和《抗敌三日刊》(后改名为《子弟兵》)在边区内外都是很有影响的。这些报刊，逐步由油印、石印发展到铅印，印数也从初期的几百、几千份发展到几万份。它们是边区舆论界的权威，同时也是抗战新文化的传播者。这些报刊的共同特点是，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在内容和编排上讲究通俗、新颖、活泼，成为边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方面最重要的宣传鼓动工具。

为办好这些抗日报刊，大批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了大量工作。《晋察冀日报》社的邓拓同志，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领导的《晋察冀日报》社，在反“扫荡”期间，经常是一面打游击，一面工作。整个报社精干得很，就是那么几头骡子，驮着轻便的印刷器材，编辑记者们背着轻便电台。邓拓同志带领大家，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与敌周旋。尽管敌人搞“铁壁合围”，反复“清剿”，情况那么危急，斗争那么残酷，但《晋察冀日报》从未停刊过。而且，他们还有一套传递报纸的组织 and 办法，能在当时的条件下，保证日报及时地送到群众手中。邓拓同志在抗战后期还编纂了《毛泽东选集》，这是全国第

一本系统编选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选读本，为传播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

边区的刊物杂志，也是丰富多彩的。如理论刊物《新长城》，群众团体主办的机关刊物《群众》，综合性的文化杂志《学习半月刊》在文学方面有《诗建设》、《山》、《鼓》、《文艺通讯》等等。这些刊物，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反映晋察冀人民的斗争生活，对敌伪的腐朽文化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和有力的揭露，对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文化生活方面，最活跃的是戏剧工作和诗歌创作。

抗战爆发后，不少革命的戏剧工作者到晋察冀边区。他们的积极性很高，我们就依靠他们，充分发挥戏剧形式的战斗作用。当时，正规的职业剧团，边区就有十多个，如西北战地服务团、抗敌剧社、联大文工团、群众剧社、抗大二分校文工团，冀中区的火线剧社和新世纪剧社，等等。各分区也都有一个精干的剧团。我深知文化工作是整个革命事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抗敌剧社成立的时候，人数很少，我对他们采取了大力支持的态度。我对抗敌剧社的同志讲，只要你们有决心把这一工作做好，即使人员再紧张，我也决不调你们的人。你们要把戏演好，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深入群众，深入部队，深入生活。将来的伟大作品，将出现在前线，产生在炮楼旁边。如果没有生活的积累，没有对生活的感觉，你们就不会取得明显的成绩，戏也演不好，演不像。剧社的同志革命热情很高，他们经常深入到部队和山村，接触战士，接触农民，同游击队一起活动，他们演出的节目充满了晋察冀的乡土气息和人民英勇斗争的真情实感。

诗歌，在晋察冀边区也是颇为活跃的。诗歌轻便灵活，容易为群众接受和掌握。特别是歌咏活动，可以这样说，根据地不管男女老少，不会唱歌的人很少。

至于美术工作，不论你走到什么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醒目的大幅抗战壁画。在村庄的墙壁上，贴的是手持钢枪、大刀的子弟兵和民兵的英雄形象，很有战斗性。美术作品中，最受欢迎的是《抗敌画报》（后改名为《晋察冀画报》），既朴素，又美观，办得很出色。在山沟沟里能够出版这样的画报，曾使许多外国朋友深感惊讶。

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汇集了众多的有志有为的文化战士，尤其是平津地区来的大批优秀的知识青年。他们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在民主革命的洪流中，经受了锻炼，受到了教育，拿起枪杆打仗，拿起笔杆撰文，他们以自己的作品鼓舞群众，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民主，为推倒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作出了贡献。他们中有不少人把热血洒在战场上，永不磨灭地存在于一个时代和人民的记忆之中。特别是 1942 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坚决地遵循着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将边区的文化工作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与人民群众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像晋察冀这样的根据地，原来都是穷乡僻壤，广大农民群众与文化是无缘的。自从根据地建立后，有了政治上进步这个前提，加上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努力，就使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逐渐结合起来了。革命根据地当时不仅在政治上是最光明的地方，在文化上也是最先进的地方。它有力地抵抗着敌伪的腐朽文化，也使虐杀进步文化的国民党统治区相形见绌。

（节选自《聂荣臻回忆录》一书）

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回顾

周巍峙

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我和它有着异常深远的历史缘分，我对它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在它艰巨复杂的斗争历程中，我在它的怀抱里成长并把我的青春献给了它。

1937年8月20日，我和出狱不久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先生，《读书生活》杂志主编、著名作家柳湜先生，还有后来写了著名歌词《太行山上》的桂涛声先生，共4人，一同离开上海赶赴华北前线，进行抗战宣传、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工作。李公朴先生作为救国会的代表通过八路军直接和共产党共商抗战。为了宣传全民抗战，9月中旬他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以及阎锡山方面共同商定创办了“全民通讯社”，以救国会名义出面，由李任社长。我即留在太原和沙琴晖同志一起主持全民通讯社的采访、编辑和发行工作。9月初我经太原去大同时，日军已迫近该地，当地政权已瘫痪，军队大都撤退。当时日本军队曾讥讽国民党军队逃得太快，他们赶不上。而我在太原时却见到刚改编的八

路军正英姿焕发，纷纷开往华北。我曾多次到火车站迎接和欢送八路军上前线，见到那些刚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战士、军官，个个都是那么生气勃勃，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他们见面使我受到很大教育。我还从他们手里要到我梦寐以求的用红、黄、绿有光纸油印的红军歌本。我们全民通讯社多次发出八路军挺进华北和平型关战斗胜利的消息。这些部队中有许多指战员以后就成为晋察冀军区的骨干。我后来也与这些无畏的战士成为生死与共的战友，长期并肩战斗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根据地斗争是以军事斗争为中心的全面斗争，因此根据地的建设也就必须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同时具有为日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提供雏型的深远意义。晋察冀边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正是根据这一精神从事斗争和建设的。

一、晋察冀文艺队伍的构成

随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在炮火硝烟中，一支朝气蓬勃的文艺队伍应运而生，前后发展人员近三千（包括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察冀边区参加文艺工作的人员）。这些青年的文艺工作者为了抗日，为了建立新中国，为了实现远大的革命理想，他们战斗在太行、五台、恒山、燕山的崇山峻岭之间，挺进在滹沱、永定、沙河、滦河的广大流域，拼搏在冀中、冀东、辽西的广阔平原。这支文艺队伍创造的晋察冀文艺作品和所进行的文艺工作，是我国近代文艺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这支文艺队伍思想先进，作风朴实，善于克服困难、开创工作，富有自我牺牲精神。

三千文艺战士，除几位年方而立者，皆为“文艺青年”，大的20岁左右，小的仅仅十二三岁。他（她）们中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青少年（如歌唱家、演员王昆、电影演员田华、作曲家曹火星等），也有少数原工农红军宣传队的骨干，如抗敌剧社的黄

日升、挺进剧社的袁琴谱。有相当一部分是京、津、沪、汉等大城市和东北沦陷区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是抱着报国之心和追求革命之志而汇集延安又由延安派出，或者径自奔赴晋察冀的。如作家孙犁、杨沫、刘佳等。

可数的几位是早在三十年代就从事革命文化工作的文化界人士，如文学家、教育家成仿吾，教育家、剧作家、翻译家沙可夫，音乐家吕骥、周巍峙，戏剧家崔嵬、丁里，作家王林，木刻家沃渣等。其中有些过去已有较高知名度，或者作过文化艺术方面的领导工作。

汇集晋察冀的文艺战士，均依其所长、所能，分配在各个文艺团体和文艺教育的岗位上。当时，军队、地方的文化艺术团体、剧社、文工团、宣传队，犹如雨后春笋蓬勃涌现。

1937年12月11日，晋察冀军区成立仅1个月零4天，边区就成立了第一个专业演出团体——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它开始是由红军宣传员和当地青年学生组成，而后逐渐发展成艺术人员甚多，业务实力甚强，在部队艺术系统中起着带头和示范作用的一个文艺团体。不久，一军分区战线剧社，二军分区七月剧社，三军分区冲锋剧社，四军分区火线剧社也先后相继成立。

在冀中，1938年初即成立了冀中军区火线剧社，蠡县新世纪剧社和回民支队抗战剧社。同年，冀中各军分区剧社相继成立。火线剧社是冀中大平原最具影响，有着较高艺术水平的综合性艺术团体。抗战剧社是边区少数民族抗日文艺团体，有其特殊贡献。1939年1月，贺龙、关向应领导的一二师到达冀中，带来了有着光荣传统的战斗剧社。后来到达冀中的还有东北战地服务团。这些文艺团体在冀中的时间虽然较短，但也为冀中文艺史增添了光荣篇章。

边区抗联群众剧社是由平山县铁血剧社发展而成，深受边区群众称赞。晋东北的大众剧社足迹遍及雁北、北岳。平西军区挺

进剧社、冀热辽军区尖兵剧社，不仅在当地影响广泛，在全边区也是闻名的。

延安革命大本营十分重视晋察冀文艺运动的发展，多次派来规模不等的艺术团体，以支持和推进边区文艺工作。有由周而复等组成的延安文艺工作团；东北干部队的诗歌团体“铁流社”；以雷焯为组长的总政前线记者团；主要成员有汪洋、陈播等的抗大二分校文工团；袁牧之、吴印咸率队的延安电影团等等。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也随妇女儿童代表团来到敌后访问，其中有些同志就留在晋察冀工作了。

1938年底，我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晋察冀，团员中有抗战前即从事文艺工作的田间、邵子南、方冰、凌子风、贾克、朱星南等诗人和戏剧家。西北战地服务团是伴着卢沟桥的炮声，在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指示下，由丁玲、吴奚如等于8月中筹建成立，它是抗战时期组成的第一个专业人才集中较多、业务门类配置较全、规模较大的抗战文艺工作团体。西战团来到晋察冀对边区文艺工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它带来了利用民族旧形式表现抗日新内容的丰富经验和新形式，带来了抗战题材的话剧、歌曲、绘画、木刻等多种新艺术，带来了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艺术工作者积极开展工人、学生文艺运动的革命作风。它创办的多期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为边区培训了大批地方文艺人才；初期为部队剧社举办的专业学习班，使一些青年戏剧、音乐干部的业务能力得到较快的提高。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同志赞扬西战团“对边区文艺界是有很大帮助的”。

以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就领导苏区文化工作的著名文艺家沙可夫为首的，由一部分三十年代文艺活动中的杰出人才为骨干而组成的华北联大文艺部及联大文工团，于1939年9月来到晋察冀后，为边区各地造就、培养了众多的文艺骨干，对发展边区的文艺创作、文艺教育，起到了影响深远的重要作用。尤其联大文

艺部教员和联大文工团艺术精湛的演出，更受到普遍的赞赏。

值得提及的是，在边区文艺队伍里，存在着几支少年儿童艺术小分队。西战团、抗敌剧社、联大文工团、冀中火线剧社等规模较大的一些团体里，均设有一个儿童演剧队、儿童歌舞队或少年艺术队，人员按文、音、美、剧等专业分成班组，边学习，边工作。西战团、抗敌剧社的儿童队尚能独立演出整个晚会节目，并被派到各地（包括游击区）完成演出任务。

二、党的关怀

边区的文艺工作从萌芽到开花、结果，兴旺发达，自始至终都得到党中央及边区党、政、军各级领导人的深切关怀。早在卢沟桥事变一个多月以后，毛泽东就对刚刚建立准备开赴前方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主任丁玲说，西战团“这个工作很重要……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又说：“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只要对抗战有利。”在西战团建团大会上，毛主席亲临致贺，勉励全团同志要继承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要大众化；要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扩大党的影响，争取抗战胜利。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1939年 7月 10 日为华北联大、联大文工团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送行时强调指出：“你们到敌人后方去，不但要打日本，还要创造新社会。”

在晋察冀，这支队伍更是得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军区彭真、聂荣臻等领导的爱护和关心。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沿着毛泽东指示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正确方向健康发展。

聂荣臻从率部开辟晋察冀边区的第一天起，就把文艺工作放

在重要的位置上。正如他在第二次艺术节看过《母亲》的演出后所说：“我们的战争是全面的……战斗虽然胜利，如果在文化上放松，也不会得到最后的胜利。”他在1942年8月谈到部队文艺工作问题时，强调说：“就是在红军时代那样窄小落后的地方，荒僻闭塞的山野地区，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原上，我们虽然没有像今天这样堂皇的篷帐舞台，受着人力物力极端困难的条件的限制，但我们仍然有着自己的文化生活，有自己的艺术。在艰苦的长征当中，我们同样有演戏，有跳舞，在雪山上也响着雄壮的歌声。”这些话充分说明他对革命文艺工作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视和关怀。

在实践中他也是这样做的。1937年12月抗敌剧社成立时，聂荣臻勉励当时负责同志勇敢地负起重任，发奋工作，并十分令人感动地说：“再困难我也不调你们的人。”1939年2月晋察冀边区召开第一次创作问题座谈会，彭真、聂荣臻均亲自出席并做了重要指示。聂荣臻提出：“我们的作品要求与边区的战斗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希望作家“深入群众之间，多多了解他们的斗争生活和他们的心理。”

聂荣臻要求部队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真正了解战士生活，“真正与战士结合走进伟大斗争中”，写出“真正反映战争的伟大作品”。他指出部队文艺工作者虽然“没有隔离斗争生活，但还不够丰富，不够深入。”这需要“丰富自己的生活，锻炼自己的修养”，有个努力发展的过程。他还说：“我们的同志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努力的方向。”“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他们发展的前途。”

关于如何对文艺作品进行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聂荣臻也作了重要的讲话，他说：“我对于文化作品的好坏，就从来很少批评，这不是自由主义，因为我们的同志还是在创作的过程。我的批评少，也不是因为今天的创作毫无成就，不值得一评。我们的作品当然也有好的。但我决不说，某人的作品如何伟

大，怎样空前绝后，因为这样的批评没有一点好处，过分的夸奖和乱捧一通，是害死人的事情。好的当然应该鼓励他继续前进，但过分的夸奖都会使年轻的作品短命夭折。可是，另一方面，向同志们泼冷水好不好呢？批评作品总是‘一无所成’或‘失却立场’，这也是不好的。固然有些问题，严格地讲起来是立场问题，但我们决不严格的批评，因为这不是作者主观上故意这样做的。我们知道，同志们多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还没有经过长期的锻炼，如果这样过高的批评，就使人没法工作。我们的批评主要是采取善意的修正的方式，使同志们在工作上有所取舍，求得工作上的渐进。如果开口就是‘政治问题’，闭口就是‘原则问题’，这将使许多文艺工作者战战兢兢，不敢动手了。我们鼓励同志们大量创作，大胆创作，有缺点就纠正，就是有些成就，也不必特别夸耀。”

彭真作风朴素，平易近人，和文艺工作者能够平等相处，不使人紧张。1938年秋，彭真在延安时，就到西北战地服务团来介绍晋察冀边区的情况，鼓励大家到敌后工作。1938年11月，中央决定西战团跟随彭真同志到边区工作，他为了赶到边区开会，走得快，沿途他告诉兵站和有关机关，对西战团要加以照顾。他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时十分强调文艺在抗战建国的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号召大家摧毁帝国主义的与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为了建设地方文艺事业，开展群众文化活动，1939年他决定把西北战地服务团调离晋察冀军区，改属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直接领导，在行政上由边区政府领导、管理，使西战团可以专心致志地为地方文艺事业的建设、为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和辅导作出更好的贡献。

彭真常常看戏，有时突然钻到由幕布或芦席围起来的演剧“后台”看望大家，和大家交谈，赞扬戏剧创作和演员的表演，问起大家的生活情况，使人受到鼓舞，感到亲切。他在1941年

初就回延安参加“七大”去了。后来有不少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回到延安见到彭真时，都象见到久别的亲人，十分激动。聂荣臻后来也回到延安开会，他还特地向毛泽东引见了我和西战团的部分同志，介绍西战团在前方的工作情况，那天毛泽东非常有风趣地说，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华北前线工作那么久，应该改称华北战地服务团了。

晋察冀文学艺术事业能够蓬勃发展，获得丰硕成果，我认为就是由于党中央和晋察冀许多负责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正确指导，由于那些至今仍然令人感念的良师。

为了适应边区文艺工作蓬勃发展的需要，更好地进行党对文化艺术事业的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于1939年12月成立了以成仿吾为书记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员有沙可夫、邓拓、何干之、周巍峙、李凡夫等同志，1940年初又改任为沙可夫任书记，委员都是文艺工作者，如周巍峙、崔嵬、丁里、汪洋、田间、黄天、王林等。

边区政府和各专署、晋察冀军区和各级政治部门对文艺工作都是很关心的。在党的支持下，在民主的气氛里，边区的文艺战士以极高的兴趣和热情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以领导、组织诸如创作、演出、学习、研究、观摩、交流等多方面的业务活动。

1939年3月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1939年7月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1940年4月成立了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晋察冀分会；1940年7月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实为文学工作者协会）

1941年6月18日，晋察冀边区还召开了文化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敌救国联合会（简称文联），并选举沙可夫同志为主任。同时成立晋察冀边区文协、剧协、音协、美协等团体。

各协会及文联成立后均制定了切实的工作纲领，并向全国文化界发出通电，表达了晋察冀全体文艺工作者的抗战热情和决心，确定了晋察冀全体文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职责，阐明了晋察冀全体文艺工作者的远大理想和追求。

由于战争残酷，地区分散，交通常被隔绝，北方分局文委、边区文联及各协会要对边区文艺工作进行经常及时的领导和指导当然十分困难，但还是在反“扫荡”间隙期间，在环境相对比较安全的条件下，争取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对各协会及文艺团体进行指导，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根据边区的工作需要，组织和奖励文艺创作和理论著作，出版各种油印刊物、文艺书籍（包括创作及翻译作品）。

在文艺工作中文联还特别强调向鲁迅和高尔基学习，出版他们的部分著作，举行座谈会，纪念会，成立专门的研究会进行深入研讨。从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各种伟大作品中求得很多教益。

沙可夫于 1926 年在巴黎学习艺术，来年去莫斯科大学学习，即开始戏剧创作和演剧活动。三十年代他在中央苏区负责文化教育及戏剧活动，编过报纸，后到延安参加鲁迅文艺学院的筹备工作，并从事戏剧创作。由于他在文艺创作、文化工作和艺术教育等方面有十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他在担任北方分局文委书记、边区文联和文协主席、联大文艺部（文艺学院）领导人期间，对边区文艺工作的指导、文艺干部的培养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平易近人，能及时发现问题，组织大家总结经验，提高认识。他发表了不少指导性很强的文章。如《向高尔基学习——祝

母亲 二次公演》、《回顾 1941 年，展望 1942 年边区文艺》、《目前边区文艺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华北农村戏剧运动和民间艺术改造工作》等一系列文章，总结、探求文艺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及时地推动着边区文艺活动前进。他翻译的《列宁与文学》、《艺术家与艺术科学》、《丹钦科和青年

戏剧工作者的谈话》，以及他亲自编写教材主讲的“苏联戏剧”和其他文艺理论课，都丰富和活跃了边区戏剧理论工作。

华北联大校长成仿吾虽然担负着培育边区各类干部的十分繁重的任务，还负有其它领导责任，但还是十分关心边区文艺活动，他积极参加一些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肯定文艺工作人员的工作成绩，鼓励大家创作。联大文艺学院在那样的战争环境中能够培养大量的文艺干部，轮训文艺团体，取得很大成绩，是学院领导及教职员的共同努力，但离不开联大和成仿吾同志总的教学布置，离不开他坚持的教学紧密结合实际，更好地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正确方针。

我和沙可夫、沃渣、田间、沙飞五位文艺工作者在 1942 年当选为边区参议员，出席了 1943 年初举行的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成仿吾被推为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议长。

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文委以及文联与各协会的领导和、推动、倡议下，边区文艺工作者荣幸地把每年 11 月 7 日这个晋察冀军区成立和苏联十月革命节这个美好的日子，选定为自己的节日——晋察冀边区艺术节。

艺术节期间，集中演出较高水平的戏剧歌咏，举办绘画展览，召开座谈会，研讨边区各类文艺问题。艺术节期间还在各地广泛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可以说边区艺术节是边区文艺工作者检阅自己的创作演出成绩、提高自己并向边区人民汇报的节日，也是各地推进乡村文艺活动、大众文艺更好地普及的节日。1940 年 11 月 7 日首届艺术节就由联大文艺学院、联大文工团、抗敌剧社和西战团联合演出了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大型话剧《母亲》。这是在十分缺乏戏剧资料，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完全凭着文艺工作者的创造热情和辛勤劳动在短时间内赶排出来的一次苏联名著的重要演出。在历届艺术节期间，不仅演出中外名剧，还有现实题材的新作。艺术节丰富多彩的活动，把文

艺工作者们的欣赏水平、审美意识提高到一个新高度。通过观摩、交流，文艺工作者们的收获是很大的。为了使普及与提高更好的结合，在艺术节期间各县、村剧团也进行各种演出及比赛活动，大大推动了乡村文艺的开展，促进了乡村歌咏队和村剧团的成长。

为了发动和鼓励创作，边区设立了鲁迅文艺奖金。对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等各种作品设有季度奖、年度奖、特别奖（包括“军民誓约运动征文奖”、“政治攻势文学奖”等）。尽管当时受着战争环境的限制，征稿偏多于环境比较稳定的北岳区（虽然冀中也有些作品应征，但冀中大部分同志坚持地下斗争，未得参加。冀东、冀热辽环境艰苦，交通困难，未能送作品来），但它的影响却遍及全边区，对全边区发动创作，鼓励创作，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人选作品包括短篇和中篇小说、墙头小说、小故事、叙事诗、街头诗、儿童诗、诗传单、歌谣、鼓词、传说、童话、报告文学、散文、歌曲、合唱、歌剧、话剧、相声剧、木刻、招贴画、连环画、布画等，都是现实题材，而且多是普及性艺术作品，此外获奖的还有建筑设计、篷帐舞台设计、画册、音乐论文等优秀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题材、形式、样式、体裁、风格等是多种多样的，也可以说是边区文艺创作的缩影。其中不少作品不仅当时有较深刻的现实意义，即或现在读起来也是激动人心的。1942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也举行了文艺创作评选活动，应征作品 300 多件，入选 50 件，也包括音乐、文学、美术、戏剧等各种优秀作品。

晋察冀是抗日的民主根据地，在这里，人民沐浴着民主的雨露阳光。在党的引导下，经过战争的血的洗礼，人民苏醒了，自觉了，组织起来了，即或被认为自私、保守的农民，一经接触真理，进入新的生活环境，便成为不惜捐躯为国的英勇战士。我

们垂危的民族顿然神采焕发，充满雄威，同敌人展开殊死的战斗。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运动战，出奇制胜，打得敌人懵头转向，寸步难行。白发老奶奶、扎着红鬃髻朝天稚的儿童，都毫无例外地参加了英勇的斗争。传奇式的战争，“连桌子板凳都能咬人，连山药萝卜也会爆炸”。党领导的战斗的边区，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是我们晋察冀文艺生根、开花、结果的肥沃土壤。英雄史诗般的生活场景，成为文艺创作的丰富源泉；广大文艺工作者一颗忠于人民的赤子之心和那种不怕牺牲、不畏艰难、奋勇前进、不断开拓的革命意志以及创造精神，使之开出灿烂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广大军民是我们文艺创作的良师益友。

在敌后各种条件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出版了不少文艺报刊和文化书籍，这也充分说明了领导上对文化工作的重视，对文化工作者学习的关心。仅根据 1942 年的统计，可见一斑，当时正在出版的文艺刊物或文艺副刊有边区各个文艺协会主编的《文艺报》、《五十年代》、《山》、《鼓》、《晋察冀文艺》、《晋察冀戏剧》、《晋察冀美术》、《晋察冀音乐》有各部门和各文艺团体主编的《诗建设》、《边区文化》、《晋察冀艺术》、《路》、《冀中文化》、《文艺学习》、《文艺习作》、《歌与剧》、《歌创造》、《战地木刻》、《连队文艺》等等，另外有些分区报纸也有文艺副刊。同时还翻译出版了一批苏联等国的文学名著和其他文艺论著，如《睡眠》（卡达耶夫）《意大利童话集》（高尔基）《死敌与其它》（苏联小说集，晋察冀日报出版）《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卡达耶夫）《表》（班台莱也夫 冀中文建会翻印）《第四十一》（拉甫列涅夫）《铁流》（节译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走正路的安德伦》（聂维洛夫 冀中文建会出版）《巴黎的陷落》（爱伦堡）《草叶集》（惠特曼）《艺用人体解剖 A、B、C》（杜焚编）《音乐家和音乐家的故事》（边区音协、肖河译）以及《斯

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演员修养》(丹钦科 筹。还出版了《鲁迅杂感集序言》(瞿秋白 联大文艺学院)

三、文学创作活动

1. 诗歌

诗歌，是晋察冀较早开放的文艺花丛中的一束鲜花。无论供吟咏的、能歌唱的，或是抄写在墙上的、印刷在纸上的，都是和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都是言人民之志，抒人民喜怒哀乐之情的。诗人们的心、诗人们的情，和人民的心、人民的情，水乳交融。“孤芳自赏”、“顾影自怜”之类诗作，完全绝迹。诗歌，“向外转”转向人民。

有街头诗、岩壁诗、枪杆诗、诗墙报、诗传单、诗与画等短诗，也有长卷诗。有抒情诗，也有叙事诗。还有格律诗，歌谣体诗。

边区早期的诗是出现在 1937 年底创刊的《抗敌报》上，有邓拓、舒同、孙毅等十几位同志的作品。1938 年秋，延安文协“战歌社”诗人柯仲平、林山等，和由战地返回延安的西战团“战地社”诗人田间、邵子南等共同发起的“八·七”街头诗运动的盛况及其部分诗作，经《抗敌报》文艺副刊《海燕》介绍到晋察冀。

1938 年底，西战团到达晋察冀，把街头诗也带到边区，写在街头屋墙上、岩壁上、枪托上、配画的传单上，朗诵在晚会上、课堂上、集市上。1939 年春，“战地社”诗人和一分区“铁流社”诗人钱丹辉、魏巍等联合发起开展边区的街头诗运动，由此晋察冀边区的诗歌运动便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1940 年李公朴考察边区后写道：“新诗歌，已为晋察冀广大的知识者之群所爱好，练习诗歌的写作，已成为一种风气。”